



于低处写诗，向高处寻光

——谈《黑蚂蚁》的精神远征

■ 杨维松（山东）

原型批评理论认为，文学作品里的意象绝非空穴来风，它们通常蕴含着原型意义，承载着人类集体无意识中的情感和哲理。这一理论尤为强调，诗歌应当以最直接的方式呈现事物本真，运用清晰、精准的意象作为情感与思想的传递媒介，让读者能够透过文字，直击灵魂深处的感悟。读打工诗人罗德远的诗集《黑蚂蚁》，恰好印证了这一点。诗人以“黑蚂蚁”这一核心意象为经，以“泥土下的蚯蚓”“压低目光里的春天”等意象为纬，编织出底层生存的立体图景。

在《在生活的低处》里，罗德远勾勒出这样的画面：“脚印纤细 一路寻觅 / 一只黑蚂蚁 一千万只黑蚂蚁 / 搬运粮食与光阴 / 笨拙坚韧”。此处的“低处”，绝非局限于物理空间的具象指涉，更是精神维度的隐喻象征。“黑蚂蚁”的“笨拙坚韧”，象征着生活在底层的打工者，他们身形渺小，却有着坚韧不拔、不屈不挠的精神。诗人独具匠心，把自己以及无数在平凡岗位上默默耕耘的打工人，巧妙地比作那一只只黑蚂蚁，刹那间，一幅鲜活的生活图景在读者眼前徐徐铺开：他们置身于生活的重压之下，恰似蚂蚁背负着重物，为了生存的粮食与梦想的微光，在岁月的长河中不断跋涉远征。

这一意象的运用可谓神来之笔，它摒弃了繁杂的修饰，以一种质朴而直接的方式，将底层打工者的生存状态毫无保留地呈现在读者面前。无需过多的渲染，读者便能轻而易举地穿透文字的表象，深刻体悟到其中所蕴含的深沉情感，或疲惫、或坚毅、或对生活的执着热爱，种种情绪交织在一起，直击人心。

当“一千万只黑蚂蚁 / 搬运粮食与光阴”的集体劳作与“城市奔走的少年”形成镜像，农耕生活与城市化进程的冲突碰撞，便产生了惊人的语言张力；当高处的“少许人的天堂和街道 / 整洁明亮 霓虹灼艳”，与低处“捡垃圾汉子弯曲的身躯”形成对比，再一次强化了打工者生活的层次感与差异性。值得关注的是，“压低的目光里 闪光的春天”这种峰回路转式表达，既揭示了生存困境的压迫性，又暗示着精神突围的可能性，让读者生发一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豁达。

于是，罗德远宣告“匍匐走在世界上”，断言“只要不回头 / 一切都不会丑陋”（《黑蚂蚁》），犹如一记重锤，敲打着人们的心灵。在这里，诗中“沉重的黑色”不仅是底层打工者身份的鲜明烙印，更是他们抵御外界纷扰的精神铠甲。这种充满存在主义色彩

的决绝姿态，赋予他的诗歌独特的力量，使其成为洞察打工者生存现状的“透视之窗”。透过这扇窗，现实的嶙峋骨骼得以显影，灵魂的鲜活血肉也被清晰折射。在罗德远的笔下，黑蚂蚁的迁徙流浪不再是单纯的空间位移，而是升华成为底层打工者在困境中挣扎、蜕变的精神远征。每一步爬行，都承载着生活的重量；每一次挪动，都饱含着对命运的抗争。

而在《我从未与生活为敌》中，罗德远又写下“我从未与生活为敌 / 只是为了绕到生活的背后 / 将其拦腰抱住”。这一诗句，展现出存在主义中个体对生活的积极融入。即便身处社会底层，他依然凭借自身的努力与坚定的选择，去拥抱生活。在荒诞的现实中执着地探寻意义，于平凡的日常里努力发现希望的微光。他以诗歌为笔，书写着对生活的热爱与不屈，让读者在他的文字里，感受到生命的坚韧与力量。

他的诗歌语言犹如淬火的铁器，在现实的砧板上不断捶打、磨砺，进而激射出思想的火花。在《陪我看流水的人》里，那看似毫不起眼的“一片羽毛”，被赋予了“既逃离陷阱 / 也拒绝天堂”的深邃内涵，刹那间，日常事物所潜藏的诗意潜能如烟花绽放。羽毛本是轻盈飘逸，在空中随风飘荡，而命运却如

沉重的枷锁，压得人难以喘息，二者之间形成了强烈鲜明的对抗。诗人运用这种突破常规的语言，在“坠落或跌倒 都是一种飞翔”这般充满矛盾却又蕴含深意的悖论之中，实现了精神层面的超越与升华。

因此，当罗德远再次将“卑微的青春”铸成“仰望的高度”时，他所做出的贡献，已不止于为底层写作开拓出一片崭新的天地，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；从精神救赎这一维度而言，他更是为在现代社会中逐渐迷失自我、被异化的人们，呈上了一套别具一格、行之有效的对抗异化的生存法则。这种在生存困境中绽放的诗性光芒，正如诗集里那株“从未放弃生长”的低矮小草，以其倔强的姿态，昭示着生命坚不可摧的精神力量。这种力量，穿越了文字的界限，直抵读者的心灵深处，让人在阅读与思索中，感受他作品里所展现的低处诗学，既是对那些不接地气的“高大上”主流叙事的有力纠偏，更是对存在本质进行的一场诗意盎然的深度探索。

例如，《那些爱过的，将继续深爱》中，诗人将“幸福苦难的泪水 / 洒在匍匐的大地”的救赎式书写，把“爱的圣经”与“匍匐的大地”并置，从而完成了从世俗之爱到终极关怀的精神跃升，在解构与重构中

建立起新的精神穹顶，庇佑着读者的心灵；《伸出双手寻找温暖》中，诗人“将彼此疼痛悲伤的血液 / 导入彼此身体”的肉体修辞，把生理痛感升华为精神共情，这种身体叙事的转向，既是对消费主义物化逻辑的反叛，也是对梅洛·庞蒂身体现象学的诗学实践；《每位低处写诗者都应加冕》中，诗人“将往日苦难当成瓦片 / 打着好看的水漂”，将苦难经验转化为审美对象的意象转换，展现出惊人的诗性智慧；《向每位擦肩而过者颌首致意》中，“植物”的隐喻消解了现代社会里人与人之间那如霜般的疏离感，等等。

在罗德远的诗集中，黑蚂蚁绝非孤例，众多卑微物象意象共同呈现了生活在各个角落的人们的生存姿态。例如，“泥土下躁动的蚯蚓兄弟”，于黑暗地底怀揣着破土的渴望；“钻出泥土的小草”，以柔弱之躯彰显生命的倔强；“城市奔走的少年”，脚步匆匆追逐着梦想的曙光；“悬在大厦半空的‘蜘蛛’”，无畏高空坚守着生活的担当。通过具体意象组合来表达复杂情感与思想的手法，与意象派的理论不谋而合，以具象承载抽象，让读者在一个个鲜活的意象中，引发对生活、命运、人性等问题的深入思考。

蕴含深情和温度的自然教育之书

——读陈华清的《鹭舞红树林》

■ 刘春柳（广东）

在新作《鹭舞红树林》中，陈华清延续了此前作品中对于大海和乡村的关注，将爱与美的注视投射到自然教育上来，创造出一个人和自然和谐相处，共同成长的故事。

为了写好《鹭舞红树林》，陈华清花费了大量的时间，查阅了红树林方面的知识，她不仅多次到海边的红树林进行考察，还多次请教守护红树林的专业人士，并下大功夫消化吸收专业知识巧妙避开“宣讲知识”的陷阱。她把稍显枯燥的红树林知识，用形象生动、充满童趣的语言叙述出来，融知识性、趣味性于一体，透露出浓浓的生活趣味和深厚的人文常识，仿佛大海、红树林是她的老朋友。这些生动有趣的科普知识跟随陈华清的脚步巧妙地展现出来，这些知识也成了这个小男孩回到家乡生活那些平凡日子里的小确幸，让他感到新鲜和惊奇，激发了他的探索欲。阅读本书，仿佛跟随陈华清的足迹遨游在红树林小课堂中，红树林、鹭鸟、弹涂鱼等海洋动植物的知识一起流淌在字里行间，使严谨、准确的科普文字有了浓浓的人情味，表现出温情浪漫且又抚慰人心的一面。

儿童文学的世界应该是一个善良美好的世界，但并不是为儿童创设一个虚假的世界，恰是为他们进入复杂社会前做好铺垫和信心。林良在《浅语的艺术》中提到，儿童文学要给孩

子们这样的底气，让他们知道“这个社会并不是十全十美的，但是你不要吃惊，不要灰心，不要失望，因为你心中已经有了爱，有了理想。此后你所过的日子，就是以你心中的爱去化解自私，以你心中的理想去照亮黑暗，以你心中的美去改造世界。”由此，儿童文学作品不光要传递给儿童世界是美好的，更要传达世界可以在他们的手中变成美好的这一理念。

《鹭舞红树林》设计了两对矛盾冲突：一是在白鹭岛上，岛东村与岛西村因红树林而结下的恩怨。岛东村世代保护红树林，视红树林为“保护神”，立下“保护红树林就是保护我们自己；伤红树林就是伤我”的村规民约。西村原来与岛东村一起保护红树林，后受经济利益驱动，全部毁掉红树林，在海滩涂上挖塘搞养殖。岛西村民到岛东村砍红树，偷白鹭鸟，双方争斗，差点出人命。两村因此结下仇怨，小孩子之间不能一起玩，成年人不能通婚。二是陈嵘木退伍分在城市工作，因不忘父亲叮嘱他保护好红树林，主动申请回白鹭岛。他视红树林为生命，逮住破坏红树林的岛西村民巫财。巫财打伤他，因此坐牢，两家成了仇家。他把与巫财女儿相爱的小儿子陈民安赶出白鹭岛。陈民安发誓不混出点名堂，决不回家乡。

陈涛涛、陈海花等孩子面对大人之间的矛盾，面对互不相往来的村庄

和人们，一开始他们感到疑惑不解，甚至有些害怕，但随着情节的发展，他们了解了事情的真相，有了自己的看法，就会作出自己的判断，随之也成长起来了。为了守护村庄和生命财产的安全，两个村庄冰释前嫌，岛西村请爷爷去教他们种红树林，两个“仇家”也开始和好，爸爸也回到村里投资改造家乡，一切都变得美好起来。陈华清在这里创设了一个相对理想，不那么邪恶和勾心斗角的空间，给了孩子们一个适应期，让他们有勇气和责任去适应社会，去创造更广阔的人生。

自然教育是让读者通过阅读作家笔下的自然之美、自然生命之美，从而自然而然喜欢上自然、亲近自然。陈华清在《鹭舞红树林》中所描述的白鹭、招潮蟹、弹涂鱼、红树林等事物的生命是美的，给孩子们以自然教育和审美教育，给孩子们自然熏陶。在这美好的自然环境中，生活在鹭岛上的人们生命状态和生活状态也是美好的。孩子们在大自然中按照自己的节奏成长，生活的磨难和挫折没有淹没他们少年的天性，在红树林中他们是大海的孩子，是一棵棵向上生长的红树。作者借由岛上孩子们的人生际遇，向读者展现出一条独特的少年儿童成长路径，唱响了一曲人和大自然和谐相处、美美与共的赞歌。

上接 09 版

让人如堕五里雾中，摸不着头脑。原来高级的诗是让人看不懂的。如果你要发难反驳，那就是你不懂审美，不懂新诗的现代性了。就此，艾华林感叹：原来诗歌是这样写的，诗人是这样诞生的啊！

在《“当代·诗歌”的现代性表达与欲说还休的语言艺术》一文中，艾华林对当代诗歌进行剖析。他认为，当代诗歌在形式上更加多样化，但在思想深度上却有所欠缺。许多诗人过于追求形式上的创新，而忽视了诗歌的本质——情感和思想的表达。“当代诗歌的审美趣味逐渐趋向于表面的华丽和形式的创新，这种趋势虽然带来了视觉上的冲击，但却缺乏深层次的情感共鸣和思想内涵。”此言不仅道出了当代诗歌的一些问题，也引发了读者的深思。艾华林不仅关注当代诗歌发展，对历史上的诗歌论争也做了深入研究。

艾华林作为一个诗人、诗评家，对现在的汉语诗人为什么没有了为良知发声的勇气，为什么丧失了为民族精神输血的冲劲和动力，深表遗憾和不满，认为这绝不是现代诗人才商和情商双重达标的高度体现，恰恰是当代诗人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受“活在当下”思潮影响，从而表现出在乎个人前途命运，计较名利得失的畸形心态。

艾华林的文章《〈余之诗〉的浅薄和卖弄》（原载《文学自由谈》2022年第1期）批评以《文化苦旅》名闻于世的著名作家余秋雨的诗《我的家谱》，觉得此“家谱”很不靠谱。整首诗除了兜售贩卖作者的那点历史知识、趣味之外，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信息和意味，就只剩下浅薄了。如果说，小说《冰河》是余秋雨散文的“改写版”和“加长版”，那么，《余之诗》就是其“缩写版”和“精简版”。艾华林披露，在《我的科举》一诗中，余秋雨更加简单粗暴地罗列众多历史人物，让“王维、白居易、韩愈、颜真卿、柳宗元、杜牧、王安石、司马光、苏轼、苏辙、朱熹、王阳明、汤显祖、徐光启、史可法、林则徐……”这些历史文化名人，成为他科举之路的“垫脚石”。

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的诗《饺子歌》（获第五届长诗奖）艾华林也不留情面地给予抨击，直指诗坛充斥着《饺子歌》《你的眉眼》《余之诗》这样无限透支自己的名气、兜售可怜的一点历史知识、贩卖其可资炫耀的文学成就的浅薄庸俗之作。这种现象的存在，这种非诗之诗的泛滥，实乃中国文学的悲哀！